

本書出版不久隨即有了中文譯本，引起注目多時。

傅高義關於廣東的兩本著作，一個二十年，一個十年；一個建設、鞏固，一個變革、開放。時代不同了，主題也不相同。這兩部著作所講述的廣東在不同時代的故事，在邏輯上有耐人尋味之處：時代在進步，而歷史有時或許會「後

退」，退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社會主義回到「初級階段」。這四個時下不常被提起、幾乎被忘卻的字，至少和「改革開放」四個字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它是過去幾十年慘痛教訓的總結，同時也是在既定的條件下為後來的社會的變革和開放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據。

知識份子問題研究的新典範

● 茆大祥、楊豔中

李著通過一個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個案，對1950年代知識份子思想批判的主要事件的發生原因、過程及其歷史影響作了縝密的考證，進而為似乎是偶然發生的歷史「個案」彰顯出歷史現象背後的內在邏輯。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 (1949-1959)》(安徽：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

如何改造、團結、利用知識份子，一直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無法迴避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而圍繞這一問題的歷史研究，自1990年代以來，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但綜觀這些成果，在史料的發掘、理論深度，以及必要的客觀研究態度等方面還存在着一些遺憾。1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了衡量歷史學進步與否的三個標準：「(一)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 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

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用傅斯年自己的一句話概括，就是「史學便是史料學」(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5-7)。

倘若以此「標準」來衡量李剛先生的《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以下簡稱李著，引用只註頁碼)，我們可以說，它是一部「進步」的史學力作。李著在對1950年代知識份子研究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果的學術探求，在史料發掘、考訂、運用上有着重大貢獻，可以說是該領域研究中的又一項重要成果，代表了一種新的研究典範。

通閱全書，李著的史料發掘，種類繁多而系統，內容翔實而細密。在史料的運用考訂上，李著可圈可點的「進步」也甚多：基本使用原始資料、巧用「反其道」而洞察歷史人物的心態語境、「倒放電影」的歷史研究法、客觀和價值中立的研究態度等。

尤為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在深度挖掘史料的基礎上，把社會學經典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法，嫻熟地運用於歷史學的研究中，通過一個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個案，對1950年代知識份子思想批判的主要事件的發生原因、過程及其歷史影響作了縝密的考證，進而為似乎是偶然發生的歷史「個案」彰顯出歷史現象背後的內在邏輯。這樣的歷史研究法頗為新穎

實用，在歷史整體觀照下，把整體的一系列關節點以個案的形式深入研究後，再加以整體的考慮，就可以得出一個有實證性基礎的結論，從而實現微觀的個案配合宏觀透視，以致相得益彰。

二

對於研究的主題，李著開門見山，首先以博蘭霓(Michael Polanyi)的「支援意識」、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軸心時代」兩個頗為晦澀的概念為切入點，詳細地闡述了與之分別對應的歷史現象——中共領袖毛澤東的知識份子觀與中共延安整風模式。透徹地理解「支援意識」、「軸心時代」這兩個概念以及與之對應的歷史現象，對於我們理解整個1950年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甚至對於理解此後如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均是至關重要。如此獨具匠心的導入足能證明作者具備了相當的歷史理論素養和歷史洞察力。

其次，對於研究的對象，李著則通過大量的史料顛覆式地證明，建國初期的知識份子默認甚至支持「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需要改造，乃至主動要求改造以求進步的主導心態給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提供了心理上的切入點」(頁31)，而指出這種「主導心態」對於理解知識份子在改造中的矛盾心態顯得尤為關鍵。

李著從建國之後第一個全國規模的思想批判運動——「對電影《武

李著指出，對《武訓傳》的批判影響了以後歷次運動：其一，形成了後來思想、學術、政治批判的一般模式；其二，毛澤東通過《武訓歷史調查記》重申了一個看法，就是舊社會的知識份子是不可靠的，是為舊的統治階級服務的。

訓傳》的批判]個案開始，指出建國後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即「輿論與學術對政治權威的依附」(頁52)——學術研究對政治權威的依附，先有結論，後有論證，學術只不過是對政治結論的解釋而已。同時，作者進一步指出毛澤東發動《武訓傳》批判的深刻歷史語境和政治意圖——一方面重申階級鬥爭和革命路線的正確性，因為否定了階級鬥爭，否定了武裝革命，實際上就否定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源泉；另一方面主要是敲山震虎，警告黨內高層。更重要的是，利用對《武訓傳》批判的運動重申且證明毛澤東在黨內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絕對權威地位。

個案最後指出，對《武訓傳》的批判造成了影響以後歷次運動的兩個重要結果：其一，形成了後來思想、學術、政治批判的一般模式。《武訓傳》批判幾乎為後來所有類似的大批判運動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模式：「聲勢浩大的思想發動、相當周密的組織保證、內容重複的批判文章、被點名的報刊的自我批評、有關責任者自覺的或應付性的檢討、領導機關的號召和規定、文化教育界的表態和動作……」(頁53)。其二，毛澤東通過《武訓歷史調查記》重申了一個幾乎終生都沒有改變的看法，就是舊社會的知識份子是不可靠的，是為舊的統治階級服務的。

緊接着，李著展開了「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檢討」的個案討論，與前一個案的關係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究其緣由，實因為李著準確地把握了「陶行知和『武訓精神』有不可

分裂的聯繫，陶行知也被人們認為是『武訓精神』的時代化身」(頁58)這一史實，並用大量的史料予以佐證。繼而李著順水推舟地指出，正是因為陶行知與武訓的這種關係，所以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時候，就面臨着如何評價陶行知的問題。實際上，對陶行知的評價也就要涉及到對國統區教育工作者，乃至整個曾經為國民黨政權服務過的知識份子群體的估量問題；更深層的來講，就是如何評價「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所謂改良主義路線的大問題。很顯然，在這個大問題上，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鮮明的。

如果說，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自然引至「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檢討」在感知上顯得順理成章，那麼接下來的「胡適思想批判」、「對陳鶴琴兒童教育理論的批判」等個案便似乎是各自孤立、毫不相干。但實質則不然，如果「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與「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檢討」可以稱為「連貫式」個案的話，那麼其跟「胡適思想批判」與「對陳鶴琴兒童教育理論的批判」則是「並列式」個案。正是這種「並列式」個案的選擇，從而為李著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提供邏輯與實際的可能，由此，讀者同樣能體會作者在個案設計上的「良苦用心」。

李著指出，陶行知、胡適、陳鶴琴三個個案的「核心內容」即是對「美國精神的象徵」——杜威 (John Dewey) 思想的批判，其中包括他的哲學思想、政治學思想、社會學思

如果「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與「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檢討」可以稱為「連貫式」個案的話，那麼其跟「胡適思想批判」與「對陳鶴琴兒童教育理論的批判」則是「並列式」個案。陶行知、胡適、陳鶴琴三個個案的「核心內容」即是對杜威思想的批判。



陶行知(右一)與胡適(左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照

想、教育學思想等，特別是關於社會變革方面的理論思想。杜威的社會變革理論的多元性與非暴力性特徵，與馬克思主義有着根本的區別。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民主，但實現目的之手段卻是「非民主」的革命手段；杜威相信目的與手段之間的一致性，即目的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確。杜威預言，馬克思主義以非民主的手段開始，必將以非民主的目的終結，結果必然是「以暴制暴」。根據杜威的理論，中國革命道路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就存在問題。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必須能說明或論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革命道路的唯一性，所以改良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必然被批判。

要肅清老師的影響，先肅清學生的影響，不失為一明智之舉，而陶行知、胡適、陳鶴琴正是杜威在中國的三位高足，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產生着巨大的影響，特別是胡適，他的哲學、歷史學、政治學、

教育學等思想影響着整個民國時期社會。而陶行知的社會教育思想固然與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且曾經被中國共產黨封為「人民教育家」、「毫無保留地追隨我們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頁77），但相比於中國革命道路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大問題，批判仍是不可避免。「胡適跑了，陶行知死了，陳鶴琴成了最好的活的反面教材。」（頁236）三位學生為自己的老師背負起沉重的「十字架」，而這沉重的「十字架」卻又是1950年代知識份子的普遍「情結」。作者如此巧妙的個案安排，使人讀罷恍然大悟！

而對於李著的其他個案，亦可作如此的分類：第一，是對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批判，如「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李著認為「《紅樓夢》研究」批判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卻是一個關鍵

陶行知、胡適、陳鶴琴是杜威在中國的三位高足，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產生着巨大的影響。三位學生為自己的老師背負起沉重的「十字架」，而這「十字架」卻又是1950年代知識份子的普遍「情結」。

革命需要她每個兒女都成為這部大機器上的螺絲釘，不但要徹底唾棄中共建國前與反動當局鬥爭所謂的貢獻，而且更要毫無保留地摧毀富有個性、主見、自尊和骨氣的知識份子形象，這也是整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點，由此個案而引發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胡風運動、批判《文藝報》以及肅反運動，所以可稱為「導入式」個案。同時李著指出，以「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為界點，此前的思想批判還局限於政治思想批判，此後，特別是胡適思想批判以及反右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判，更注重對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和學術方法的批判，從而形成一種先確定立場、觀點和方法，然後再找材料，甚至材料也不用找，以論代史，循環論證的「學術風氣」。

第二，是對中共黨內個別知識份子的批判，如對華崗的批判；但重點是對陶行知、胡適、陳鶴琴等一類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批判，如「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批判」中對眾多大學教師的批判，對馮友蘭、費孝通、雷海宗等「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批判等。而「對秦牧拒絕改造的批判」似乎顯得有點難以界定，因為秦牧既不屬於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類型，亦不屬於後兩者類型，或者說是介乎於後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員。

但李著指出，秦牧的個案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中非常具有典型性，緣於內在的兩個大小邏輯和李著所要表達的一個核心思想。小邏輯是在全面控制性的社會裏並不存在獨立的媒體，媒體都是有行政級別的，附屬於宣傳、政府部門或社會團體，級別高的媒體權威性當然就高。媒體都是有專業分工的，媒體都必須在規定的範圍內說話。大邏輯是「知識份子需要改造運動」的需要，通過典型（無論是正面典型，

還是反面典型）來推動運動的開展或深入，是當時政治運作的典型模式。核心思想是不管是甚麼人，既然參加了革命，就要放棄自己的一切。革命需要她每個兒女都成為這部大機器上的螺絲釘，不但要徹底唾棄中共建國前與反動當局鬥爭所謂的貢獻，而且更要毫無保留地摧毀富有個性、富有主見、富有自尊和骨氣的知識份子形象，這也是整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三

在史學研究中，我們可以說，理論和史料是一種互動的關係。理論向一切史料開放，接受史料的檢驗；而史料接受一切理論的解讀，在相互開放中修正理論，豐富史料，詮釋史料。正是依照這樣一種史學研究思想，李著在全書的最後一章「政治、學術與知識份子生活方式的變遷」中昇華了這兩者的深刻內涵，論述了一系列的學術理論，如「國家民族主義的內在困境說」、「改良主義、中間路線與革命道路說」、「學術自由與學術倫理的張力說」等。全著末了，李剛寫道：「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嗎？也許，人真的不過是歷史不自覺的工具」（頁315），從而呼應了全書的主題——1950年代以來知識群體話語的轉型以及生活方式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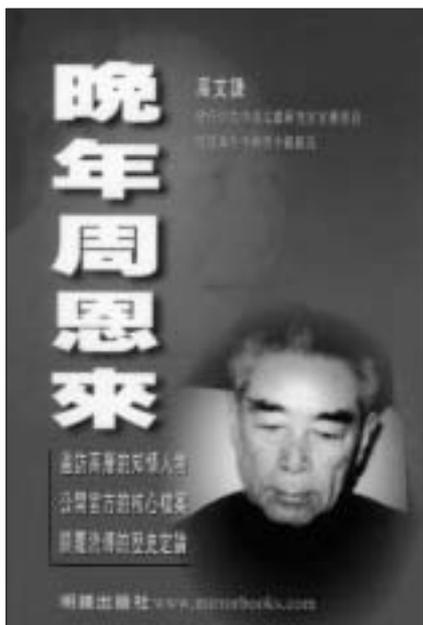
白玉難免會有瑕疵，至於書中的一些觀點以及史料的運用，筆者認為還需要進一步商榷，如李著是否忽視了所考證的知識份子對思想

改造的「主導心態」在歷次運動中的作用？所選的歷史個案是否能完全反映1950年代所發生的事件？相關的個案研究能否進一步深入？以及如何考慮史學著作的「氣」與「美」的關係？當然，瑕不掩瑜，李著在

同類歌功頌德的著作中猶如一陣清新的風，吹拂過真相式微、文化貧瘠且浮躁的社會，開闢了現代知識份子研究領域的新境界，標誌着知識份子研究正在邁向一個更高的水準。

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

● 徐霞翔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

一個偶然的機會，拜讀了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引用只註頁碼）。此書主要闡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的活動軌迹，並試圖在文革的背景之下，從中共的政治文

化以及周的個人性格特徵、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等方面來建構解釋框架。該書與很多中共領導人的傳記不同，資料豐富，暢所欲言，洋洋灑灑，這可能與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個人經歷有關。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曾參與編寫中國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等書。

《晚年周恩來》最大的特點是對周的性格刻畫明朗，並以之為主線貫穿全書。在第一章中，作者即通過與毛對比的方式來凸顯周的性格特徵：

不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是南方人，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卻迥然不同，相去甚遠。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個偏僻貧瘠的山村，是個地道的農家子弟。而周氏則出生在地處江浙的魚米之鄉、交通文化都

《晚年周恩來》主要闡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的活動軌迹，並試圖在文革的背景之下，從中共的政治文化以及周的個人性格特徵、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等方面來建構解釋框架。